

# 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 理论依据、可能路径及其价值取向

谢清果 徐莹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近年来,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发全球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首先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则离不开“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本文选取“天下”“中”“一”这三个中华文化沟通智慧中的核心范畴,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中对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可能、必由之径和众望所归的系统论述。具体说来,其一,“天下”理论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沟通主客体、沟通内容和沟通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指明了建构的可能——融通天下;其二,“中道”智慧为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提供了路径与方法,进而阐发儒道佛三家对于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在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方面的启示——中和至上;其三,“天人合一”理论为人类沟通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原则与终极目的,从而阐释了人类沟通共同体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中;一;人类沟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911;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19)06-0046-9  
DOI:10.19480/j.cnki.cmgc.2019.06.007

## 前言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而其具体的理论内涵却是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才明确下来:“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sup>①</sup>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每一个维度都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与制约,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这种潜移默化、千丝万缕的影响总是随风潜入夜般地将全球各国或松或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脱离不了全球化的背景。而在“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到两个关键词的支撑,即“关系”和“沟通”。人乃社会意义上的人,人与人的相处离不开沟通,想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离不开“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出现。

那么“人类沟通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它应该具备以下几点特征:1.“人类”限定了其理

---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  
徐莹,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5)。

论适用范围需基于全人类的全球视野, 即有“天下”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均强调人与人之间是关联的, 全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相连形成了天下整体; 2. “沟通”是方法论而不是理论, 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即为“中”的动态过程; 3. “共同体”则为人类沟通的期待所在。这个共同体既指人类沟通过程中的共同体, 亦指通过人类沟通的“中”的过程, 而最终实现天下一家的“一”。而我们也将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必由之径和众望所归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期通过辨明人类沟通共同体, 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些微助力。

## 一、“天下”理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理论基石

全球视野下的人类沟通共同体, 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没有隔阂的定语对其进行词义解释, 如“世界”一词, 初看其似乎是把全球都囊括在了一个体系之中, 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却会被分为“西方世界”“东方世界”“第三世界”等, 恰是这样的潜意识划分很难让人在理解人类沟通共同体时有一个平等的一体化的思维。而这里如果换成中国的“天下”, 则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概念深深承载着中国从古至今的“天下无外”<sup>②</sup>的思想精髓, 今后也可以更好地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实现奠定全球一体化以及民族平等性的理论基石。

### (一) “天下”：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1. “天下”观念的形成。“天下”观念在周代得以形成, 周代的“天下”观念中, “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 中国即诸夏, 为诗书礼乐之邦, 在层次上居内服, 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行同鸟兽, 在层次上属外服, 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 无限地延伸; 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 合天下为一家, 进世界为大同”<sup>③</sup>。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的中国的天下观念不存在任何的将他国占为己方财产的意思, 而是寻求在一些共同的方面达到观念上的一致。而其中的“延展”, 重点突出的并不是政治性的延展, 更多的是以诗书礼乐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延展和共享。

2. “天下”是一个理论。“天下”这一概念因本身承载着浓厚的中国情感, 承载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文化、社会、精神等精要所在, 而在世界思想史上被深深打下了中国的烙印。在世界上倡导“天下”容易被一些人士认为是中国的一家之言, 是中国想要争取世界话语权的一个策略性话语建构。但是, 正如赵汀阳所说: “中国是个故事, 而天下是个理论。”<sup>④</sup>故事具有地域的归属, 但是作为理论的“天下”应该是适合于任何其所适用的国家地区。毕竟, 一个理论的传播更多是因为其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

### (二) “天下”理论给予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可能

1. 淡化民族中心主义, 促进沟通主客体的交互沟通意识。我们认为, 任何国家或个人在实现国际跨文化沟通时,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即是民族中心主义。所谓民族中心主义, 即“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 包括人们的行为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等”<sup>⑤</sup>。民族中心主义至少从沟通主体方面带来两点阻碍: 一是当沟通主体按照本族文化去衡量他民族的文化时, 产生的优劣心理评价会影响沟通心境; 二是存在排斥, 从心底里认为其他民族与自己并非一体, 在沟通的过程中自然会存在极强的防备心和不安感。而在“天下”理论中却可以有效规避这种沟通障碍。《礼记》中说: “天无私覆, 地无私载。”这里“天下”不是单纯的指代地理区域的辐射, 更多的是从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角度去看世界, 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体系中的一切生灵皆平等地享受天地赐予的一切生存资源, 并拥有平等地进行沟通交流、建立关系的自由。正如钱穆所说: “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 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sup>⑥</sup>只有作为互为沟通主客体的不同个体都拥有如这种“天下”的无外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 我们的人类沟通共同体才真正成为可能。

2. 求同存异, 摆正了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沟通内容。“无论是圆的天还是方的地都有一个中心, 从这个中心生发的文明之光照耀着华夏世界并辉映着四周的‘蛮荒之地’, ‘天下’因此成为‘以文化之’的人文

世界——人和万物共同的家园。”<sup>⑦</sup>可见，在“天下”理论下，人类沟通共同体更多地注重于与文化相关的内容的沟通，且在人类沟通过程中可以有选择性地选取沟通内容。这种选择可以以“求同存异”来总结。所谓“求同”：莱布尼兹“逻辑地”推想上帝的世界标准是万物的共可能性。<sup>⑧</sup>由此不难看出，无论你是处于地球的哪一端，也无论你处于经济水平的哪一个层次，只要你属于人类群体，那么就肯定有一致之处。如当代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整个世界存在共同的沟通主题，即希望通过沟通去实现共同目标，如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国家的主权等问题，都是各个国家均存在的共同问题，将这些作为沟通的内容就可以促进各国加入人类沟通共同体。其次，我们再来看“存异”。《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在沟通过程中正是因为存在不同之处，才有了沟通的意义，否则所有国家呈现沟通内容的方式以及呈现的沟通内容均别无二致的话，也就不存在沟通的必要了。

3. 共生性传播，有效的沟通方式。葛兆光说：“人们生活在许多自然的村落中，一些自然的村落围绕着一个叫强大的‘城’形成共同体‘邦’，这些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又属于一个庞大的联盟，村落的共同体在联盟内和平共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统一体内，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国当时能够了解的‘天下’。”<sup>⑨</sup>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葛兆光认为天下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群体、再由一个个群体组成的更大的群体，并处在这样一种不断的累积扩散之中。而在沟通的过程中，想要让沟通没有障碍、顺畅有效，依靠这样的天下体系形成程序去进行累积式、传递式扩散，才能确保沟通的有效性。原因有二：第一，这种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直至更大的全人类共同体，其传播方式可以依靠一种熟悉式传播优势，毕竟有共同性的群体在沟通过程中是更容易实现理解和交流的；第二，通过各个交流、层层传递，其沟通的目的和影响的范围会实现最大化，沟通速度上最具效率，沟通过程会实现最短化。这对于天下体系中的全球范围的沟通共同体，是最有效、最合适的沟通方式。而在这里又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即贾文山提出的“涵化哲学观”，其指出“涵—演—变—化构成宇宙中一套完整的、相符相成和循序渐进、不断循环、生生不息的行动链，维护着宇宙的多元和谐状态，服务于人类和而不同的道德理想”<sup>⑩</sup>。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事物的对立不是绝对的，是在共生性系统之下不断涵、演、变、化的。中国的“天下”观已经为全人类的有效沟通提供了“涵”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再有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沟通方式、沟通渠道、沟通环境等的演变，在这种不断演变之下，最终实现质的飞跃，而实现无障碍的沟通。当然，这里所谓的“无障碍”是建立在涵化过程不断循环的基础之上的，沟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障碍，在其基础上都会被不断克服和解决。中国的涵化哲学观理论可以说为我们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又一种保障和可能。

## 二、“中”道智慧：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必取路径

在以中华“天下”理论论述了人类沟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并坚定了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的信心之后，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何以实现？这就是一个贯穿于构成中国文化各学派主旨思想之成分的要素点，即“中”。“中”之思想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影响深远。而很好地理解并发展“中”之思想内涵，可以为我们认识、理解这个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最终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

### （一）道家“中”之“道”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内向传播

传播学上通常认为内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称人内传播、内在传播和自我传播，指的是一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sup>⑪</sup>任何传播归根究底都是对于人的传播、对于人的意识的传播，只有经过人的内在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传播过程才有其现实的意义。借助陈力丹先生的话：“通过人内传播，人能够在与社会他人的联系上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不断实现自我的发展和

完善,从而使得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sup>⑫</sup>由此,内向传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提到重视内向传播,不自觉地就会令人想起老子。正如仝冠军博士认为:“相对于外向的传播,老子更重视内向传播。”<sup>⑬</sup>而李敬亦指出:“老子则重在通过内向传播排除智识的蒙蔽,认知和把握最高的‘道’。”<sup>⑭</sup>郝明朝在《〈老子〉“中”“和”思想发微》中指出,“道”为老子衡量“中”“和”的标准。可见,在“中”思想的指导下,要想通过把握老子思想去发展内向传播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实现,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即准确了解老子的“道”——

1. “守”之道。《道德经》中提及“中”字的只有六处,而其中与我们论题有关的只有一处,即“不如守中”(第5章)之“中”。对于这个唯一的“中”,学界也是众说不一,但论者则更倾向于陈鼓应先生的解释即:“守中,作‘守冲’解,‘持守虚静’的意思。”<sup>⑮</sup>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清楚,即“守”什么?论者认为,此处“守”的对象指的正是“道”。谢清果指出:“老子以‘道’的公正、公平、全面、周到而实现宇宙间秩序的自然维护,即无为而治。”<sup>⑯</sup>而只要我们可以守住如此的“道”,那么在内向传播过程中则可以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当然这里的岿然不动并不是指死板的不懂变通,而是指可以有自己的内在符号意义加工标准,不易于被外界干扰因素所左右。可见,“守”之道重在守,即在内在传播过程中内心有一个“道”的坚持,这个坚持之所以需要守,在于其守之过程十分之不易。

2. “中”之道。守之道在于“中”,在于“虚静”。那么究竟何为“道”呢?陈鼓应先生把“道”的意义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实存意义的道。二、规律性的道。三、生活准则的道。<sup>⑰</sup>经过陈鼓应先生的这一总结,那被老子示意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时有时无、时实时虚、时隐时现的,到一下子从抽象体变成可见之理论呈现于众人眼前。那么在人类沟通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的道就很好理解了,即“中”之道。在人类沟通过程中,所有个体需要坚持的“道”关键就在于其“中”。即在沟通中在内心深处设置一个不易改变的,却又不带偏见又符合科学标准的“道”,根据这样的“虚静”的无所偏见、偏激的“道”去指导内向符号意义解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由于个体的不同而在内向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符号意义的扭曲性解读,从而更好地避免了沟通冲突。可见,人类拥有了“中”之道,是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最基础的需求。

## (二) 儒家“中”之“礼”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人际传播

所谓人际传播,通俗一点解释即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库利说,交流在这里的意义,是人的关系存在和发展的机制。<sup>⑱</sup>如果说内向传播需要在意的是内在的“道”,那么人际传播需要在意的则更多的是外向的“礼”。郝明朝在其《〈老子〉“中”“和”思想发微》一文中明确指出“礼”是儒家衡量“中”与“和”的标准。当然,这里论者并不是想证明“礼”是人际传播需要关注的唯一的因素,而只是想让大家意识到“礼”在于人际沟通中的重要性。

1. 人际交往符号之“礼”。周礼最初阶段“本是周族在其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的一整套的氏族习俗,是周族的传统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具有不成文的习惯法的性质”<sup>⑲</sup>。到了西周,周礼已经发展成为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成为维护奴隶制的工具”<sup>⑳</sup>。而孔子则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主张“克己复礼”。由此不难推出,即使后期孔子对于周礼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其表现形式还是离不开礼节、习俗。正如王涛所说:“‘礼’既是帮助个体克己以修心的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又是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仪节形式。”<sup>㉑</sup>在人际沟通过程中,“礼”更多的是以一种仪式符号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以现代化为背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每个个体以“道”强化了自身的内向传播之后,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则应该以内在之“道”去催发外在之“礼”,以相应的礼仪去进行沟通和交流。中国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礼仪之邦,每个个体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必须以具有亲和力的、优雅的礼仪去拉近沟通者的关系,尽量使各种外在的礼仪符号可以为他人所正确解读。

2. 度之测量工具之“礼”。孔子具体阐述中庸体现在《论语》这两段记载：“子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sup>②</sup>可见，在人际沟通过程中要注意一定的度。这里的度我们认为应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在“礼”之坚持过程中，把握不住度，就会让礼变质，经受不住“礼”之特质的比较和度量。正如“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sup>③</sup>中，“狂”与“狷”是两种相对对立的品质，前者流于激进，而后者则过于畏缩，这两种品质体现出来的都不是符合“礼”的气质和作风。只有把握好度，才能拥有一种让人感觉到舒适和易于接受的气质；二是在坚持“礼”的过程中需注意灵活有度，以敏感的感觉去察觉“礼”的变化，并可以随时跟进这种变化，将这种变化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生活、工作的沟通交流中。而中庸亦强调“君子而时中”<sup>④</sup>，此处之“时中”很精辟地总结了君子在对“礼”之坚持过程中对于变化的把握。此处的“时”包含了时间、场合、对象等的变化，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所坚持的“礼”应该有所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沟通和交流。

### （三）佛家之“观中”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指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sup>⑤</sup>这里我们先不论此概念本质内容，仅从句子的本身去看一下其涉及的因素，可以发现其包含的内容十分繁杂：其包含的独立性名词就有职业传播者、传播机构、传播媒介、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共13个，而这些独立性名词在大众传播的主线中又都具有相应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大众传播得以实现，离不开这些对象的相互勾连；而机构和媒介的意义的实现，也离不开大众传播；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通过大众媒介，经过传播者和传播机构把关到达受众，才实现了其自身的意义等。列举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大众传播中的一切对象得以因有意义而存在，都在于其以其他对象为条件，而这种条件关系的存在又是相互的。佛教有一个中观学派，其核心理念即为“空”。而关于“空”的限定，龙树大师在《中观》的偈颂里阐释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化为三方面的内容，即“因缘起”、“假名”和“中道”。<sup>⑥</sup>而正是“中观”核心概念之“空”的这三方面内容，对于人际传播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1. “因缘起”之大众传播主体多样性。“因缘起”的意义在于其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是处于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大众传播的传播主体，尤其是新媒体发展迅猛的今天，更是体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把关人”的多样性。而随着把关人理论的发展，现今对于把关人的研究则比较侧重于谁在把关。在新媒体崛起的当代，每个人均可以通过一个手机或一个电脑将自己想要传递的内容和想要表达的观点向大众进行传播。可见这种把关人已经从原来的媒介组织或媒介组织中的个人发展成为了原子化分散的大众个体。在这种传播主体多样化以及网络匿名性便利的今天，除了传统的把关人制度，现在则需要更多的传播主体个体树立起把关意识。而这种传播主体个体的把关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把握：第一，美国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库尔特·卢因基本上从人自身的心理因素来进行分析，将其影响因素归结为人的认知结构和动机，而这种动机则包含了选择的价值判断、需求和要克服的干扰或障碍。这是传播主体个体自身的因素对自身把关行为的影响；第二则是各个传播主体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是国家、社会、文化层面的相关政策或变化对于传播主体把关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均会对于每个个体自身的把关标准进行不断的冲击、调整和再固化。而这种固化只是相对的，因为这种影响是处于时刻变化和循环的过程之中的，“因缘起”则没有固化。在人类沟通过程中，我们均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种影响传播把关人的把关意识和标准的形成过程，从而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培养出强理性、高素养、大范围的把关者群体。

2. “假名”之大众传播内容N级传播。“所谓‘假名’（PrajñaptiP），是指凭藉或依靠名言概念而设施的意思。说‘空是假名’，意思是说‘空’是基于人们对事物存在形态的认识，并透过言语设施而表现出来，

是语言或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并非实在。”<sup>⑧</sup>众所周知，人类在沟通过程中是靠符号传递信息的，这些符号所承载的传播者的意义正如“假名”之“空”，这里的“空”并不是指没有意义，正相反，其所承载的意义正因为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并非实在而不具备固定性，因此会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解读为各种不同的意义。而这种解读的意义变异更是会由于传播层级的变化出现更多与传播者意义不同的解读。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由于符号传递的对象广泛性，使得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传递过程会呈现非常明显的多层次传递，那么这种符号意义解读的把控更是会不由传播者意图所掌握。如何去控制这种情况？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中所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我们可以将大众传播的“传播”分析为由传播者到达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到达受众，最后再由受众反馈给传播者的过程。而这个理论后来又在很多学者的共同研究下发展成为了N级传播，即中间环节可以更多层。在促成人类沟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传递符号意义的正确解读，而避免由于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意义使得传播主客体之间产生误会，并由此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或冲突。而在借鉴了“假名”的分析后，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预防和改善：第一，作为传播主体，无论是传播组织亦或是传播个体，都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传播素养，尽量借助可以清晰承载传播者意义的符号进行传播，在源头上尽可能降低符号意义被歪解的可能；第二，对于传播主体行为需要从法律规制、行业规范、社会舆论等方面予以严格要求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新媒体时代，更好地规范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第三，应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必要时加以有意的培养。既然传播的符号均为意识层面的“假名”，尤其是涉及到跨文化传播时，很多受众囿于自身知识面的不足或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出现解读能力不足的问题。此时，我们就需要意见领袖的解读和引导，促进与主流舆论的同频共振。

“中道”之大众传播立场需谨慎。龙树的“中道”具有“超越”的意思。这里的“超越”主要针对的是单方面执着于“空”或“有”，为防止既执着于“空”又执着于“有”，龙树故此强调对二者的超越，超越两边即是“中道”。我们借鉴这种观点，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sup>⑨</sup>由于“中道”体现了一种避免主观偏向的哲学内涵，在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在全球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大众传播更应该借鉴此观点。即在人类沟通传播过程中，需要将传授双方很好地进行结合，而不能有所偏颇或忽视。古人以哲学命题告诉我们，只要是有益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有助于全人类和谐共赢，且不具有原则性意识形态等方面曲解的解读，都是可以接受的。

### 三、“天下一家”：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的终极价值

人类沟通共同体形成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类沟通共同体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分析了这个问题之后，对于人类沟通共同体的概念内涵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论者认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众望之的即在“一”。如儒家主张“天下大同”（《礼记·礼运》），道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而佛家则讲究“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金刚经·一合理相分》）。可以看到儒释道三家均给予了“一”崇高的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追求“一”却并不是追求完全相同，中国人一直强调“和而不同”，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形成相应的平衡和协调，在平衡和协调中有序发展即为最好选择。

#### （一）人类沟通共同体之“大同”

1. 大同思想源流。关于大同思想，最早是由儒家提出，如《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的理想社会又怎能不令人神往？中国

近代史上亦有很多人对此表达了深切的期望,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日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sup>②8</sup>而孙中山先生更是以大同世界表达了其最高的政治理想。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之上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之国家”最终将进入它的高级阶段“大同世界”。<sup>②9</sup>而毛泽东也深深被“大同”理想所吸引,他在致老师黎锦熙的信中憧憬到:“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sup>③0</sup>可见,从古至今,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是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对大同世界的期待也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气质。那么现代世界接受中国这样的“大同”源流吗?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全球化首先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意识,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了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sup>③1</sup>可见,在“风险”之下,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早就已经成为了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国均需要去了解这个新的世界,去接受这个新的世界,去更好地维护这个新世界。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向往,亦或是现实层面的需要,“大同”世界均是大势所趋。

2. 人类沟通共同体之大同。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大同世界抱有怀疑的原因,在于其考虑到了国家的区隔、民族的抵触以及政治的障碍。但当我们促成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大同世界时,则并不存在这方面的障碍。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沟通”不应被地缘因素所阻隔。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一个概念,即“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文明形态具有三个侧面:政治、经济、文化。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而政治、经济则是次要的成分。<sup>③2</sup>正如我们上文所说,沟通内容并不是干涉别国内政,而是在于各国共同的发展目标。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则可以说是沟通的首要内容。在我们做好文化的沟通的基础之上,再去实现政治、经济的合作交流就将如鱼得水,并且水到渠成。汤因比还说过:“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选择实际上只有两个:要么共有—一个世界,要么毁灭。”<sup>③3</sup>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全球文明的前进脚步从未曾停止。而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地球村越来越小的环境之下,这种整体意识更是被全球各国人民所接受。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是可以脱离其他国家或人群而发展的。这样的思想至少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极好的思想基础;第二,促成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其目的不是区分优劣、进行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便于各国、各民族即各政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减少误解和敌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当然,沟通共同体的发展与形成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全球人民共同努力、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这正如汤因比在“挑战—应战”理论中所解释的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sup>③4</sup>同样,人类沟通共同体的形成也可借鉴这一模式。只要我们在合作交流过程中,根据挑战而不断赋予人类沟通共同体这一概念以更具新意和活力的内涵,就可以在所谓“挑战—应战”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构建和完善人类沟通共同体。

### (二) 人类沟通共同体之“一合相”

《金刚经·一合理相分》中提到:“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我们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真实情况就是万物都是“众缘和合”的“一合相”。<sup>③5</sup>十年前,台北曾举办了主题为“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此论坛在宣言中提到的“求同存异”“平等互谅”“增进希望”“勇担责任”“共克时艰”“转危为安”等等理念,都是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诠释。<sup>③6</sup>

人类沟通共同体需要达到的境界,即在交流沟通过程中摒弃偏见,以平等心态去看待沟通相关体。这其中,大到国家沟通相关体,小到个人沟通相关体,在沟通的过程中都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沟通环节的一个部分,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每一个部分的相互配合,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境界。

### (三) 人类沟通共同体之“天人合一”

“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sup>⑧</sup>可见,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内涵丰富。不难看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国际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基础。袁靖华曾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和’文化的现代传承与激活。”<sup>⑨</sup>由此不难看出,人类沟通共同体可以通过促进“和”而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而此处的“和”,我们需要明确其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理解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合理调整和适应的生态系统。“天人合一”为实现人类沟通共同体,并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沟通和交流平台。

#### 四、结语

传播学亚洲中心学派倡导者三池贤孝曾尖锐地指出:“我们从未在亚洲语境中透彻地思考过传播的意义。”<sup>⑩</sup>而中国传统文化却为今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理论养料。无论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传播学本土化,我们都首先需要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并积极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来。与此同时,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也可以在西方传播学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前提下,更好地发展、丰富既适用全球语境、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

#### 参考文献:

- ①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②赵伯雄. 春秋学史[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400.
- ③邢义田. 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A]. 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1: 454-455.
- ④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 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1.
- ⑤田穗文, 龙晓明. 旅游发展中的跨文化研究[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3(07).
- ⑥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23.
- ⑦李宪堂. “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J]. 学术月刊, 2012(10).
- ⑧赵汀阳. 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J]. 哲学研究, 2014(06).
- ⑨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1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8.
- ⑩贾文山. 涵化哲学观对中国主导新全球化的启示[J]. 对外传播, 2015(03).
- ⑪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73.
- ⑫陈力丹, 陈俊妮. 论人内传播[M]. 当代传播, 2010(01).
- ⑬全冠军. 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5: 183.
- ⑭李敬一. 中国传播史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83.
- ⑮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81.
- ⑯谢清果. 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J]. 国际新闻界, 2011(06).
- ⑰老子今注今译[M]. 陈鼓应注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3-28+33.
- ⑱【美】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 何道宽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8.
- ⑲匡亚明. 孔子评传[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192.
- ⑳朱义禄. 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336.
- ㉑王涛. 孔子“礼”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价值[J]. 理论学刊, 2007(04).
- ㉒陈岩立. 《论语》全解读[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255.
- ㉓季旭升编. 论语[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97.
- ㉔卫湜. 中庸集说[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 48.
- ㉕邵培仁. 传播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5.
- ㉖成建华. 中观佛教的渊源及其理论特色[J]. 世界宗教研究, 2015(06).
- ㉗成建华. 中观佛教的渊源及其理论特色[J]. 世界宗教研究, 2015(06).
- ㉘杜继文主编. 佛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85.

- ⑳康有为.大同书[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277.
- 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524.
- ㉒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36.
- ㉓【德】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4.
- ㉔【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5.
- ㉕【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73.
- ㉖李卓.对“文明的冲突”的一种传播学阐释——基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思考[D].上海:复旦大学,2012:11.
- ㉗陈坚.“大道和生”与佛教“缘起论”——评钱耕森教授的“大道和生学”[J].衡水学院学报,2015(05).
- ㉘佚名.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宣言[EB/OL].(2009-05-19)http://www.wuca.net/doc-11628.html,[2017-6-2].
- ㉙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DB/OL].新华社,2014-05-15.
- ㉚袁靖华.中国的“新世界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的国际传播[J].浙江社会科学,2017(05).
- ㉛陈国明.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55-74.

##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 Theoretical Basis, Path Options and Value Orientation

Xie Qingguo, Xu Ying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idea is first and foremost rooted in the broad and profou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World", "Middle Way" and "One" which are among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sdom to explore the systematic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le 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h and people's expectation rooted in ethos of Chinese culture. Specifically,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uman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i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world. The "Middle Way" wisdom offers ways and methods for building the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in the aspects of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theory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ovides the value principle and ultimate aim for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hence looks into the nirvana tha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tries to achieve.

**Keywords** : community of shared communication, the World, Middle Way, On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著名学者谢清果简介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传播史方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传播学系访问学者，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主编，主要从事华夏传播研究、海峡传播研究、科技传播研究。学术研究主要贡献与特色：

1. 拓展华夏传播研究新境界，提出建构“华夏传播学”的学术研究目标，在建构理论体系方面有所建树，在学科建设方面有所进展，已形成本、硕、博三个层次的教材和教辅建设体系。主持学校核心通识课程《华夏文明传播》，先后编撰出版了《华夏传播学读本》《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华夏传播学引论》《华夏文明与舆论学中国化研究》《光荣与梦想：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四十年（1978-2018）》等有特色的成果。

2. 推动中华文化经典与传播学的对话与融合工程，将《中庸》《论语》《庄子》《墨子》等元典，与《对空言说》《传播的历史》等西方传播学经典进行学术对话，努力阐发中华元典的传播学智慧，从而为建构传播学“中华学派”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已经出版《中庸的传播思想》，即将出版《论语的传播思想》《庄子的传播思想》《周易的传播思想》等系列丛书。

3. 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希望系统梳理华夏文明的传播特质，以推进中西文明和谐交流，提供“中国方案”，并阐述了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提出了华夏传播观的特质在“共生传播”。目前正带领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已撰写了《中华文明传播的世界意义》《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等系列论文，主编《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

4. 提出“老子传播学”研究新领域，努力在老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方向有所成就。主持福建省精品线上课程和厦门大学核心通识课程——《道德经》，已出版《和老子学传播——老子的沟通智慧》《和老子学管理——老子的组织传播智慧》《和老子学养生——老子的健康传播智慧》《大道上的老子——〈道德经〉与大众传播学》《生活中的老子——〈道德经〉与人际沟通》等系列作品，即将出版《道德经大众读本》《和老子一起思考》等作品。

5. 拓展海峡传播研究新方向，提出建构“对台宣传学”的构想，深化了“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系统阐述了“建构两岸传媒特区”的构想。已带领团队系列研究了台湾新闻观念的变迁，出版了《两岸关系与新闻宣传研究》《台湾新闻观念变迁与两岸传媒交流前瞻》《新媒体与两岸关系》等著作，主编《两岸关系与海峡传播研究文库》。